

河北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六輯



0.6

5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875印张 168,000字 印数:1—5,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64 定价:1.15元

目 录

回忆王若飞同志在绥远被捕前后的经过·····	王任之(1)
屹立在敌后平原上的《人山报》·····	文 亮(3)
瓦解侯如墉部队的一场斗争	
——在石家庄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王子兴(53)
孙岳将军传略·····	牛国华(78)
回忆高福源的一段轶事·····	赵清海(101)
伪华北治安军概述·····	陶广仁(105)
我所知道的河北民军·····	王育英(122)
张荫梧与河北民军·····	郑一民(134)
记蒋介石的一次召见·····	韩立才(164)
我脱离殷汝耕的经过·····	霍实子(167)
迁安造纸业的发展·····	马咏春(180)
丰南县猪鬃业的兴衰和发展·····	张贵宸(190)
李老显与显记纸厂·····	马咏春(199)
已故著名河北梆子女演员刘喜奎轶事·····	陶广仁(205)

回忆王若飞同志在绥远 被捕前后的经过

王任之

1935年，笔者担任绥远省政府公告组长，对王若飞同志在绥远被捕前后情况略知一二，现笔录于下。

关于王若飞同志被捕经过，据省府俄文秘书云泽(蒙族人)先生说，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王若飞受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内蒙开展革命工作，包头是他的据点，云先生同他一起工作，是他主要的助手。当时王若飞刚从国外归来，尚未改装，身着西服。而包头是个土镇，西北风吹来，满街尘土飞扬，此地文化落后，街上往来行人多是普通百姓，穿西装革履的人极为罕见。因此王若飞的装束十分显眼，并引起公安局的注意。王当时住在包头的泰安栈，这个客栈所住客人很复杂，什么人物都有，一向是便衣暗探监视的对象。不久暗探们发现，这位西装旅客接触的多是一些衣衫褴褛的穷人，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包头公安局长马秉仁决定将其逮捕。一天午夜过后，王若飞在客栈被抓走，投入包头监狱。公安局仍在泰安栈留下两个便衣守候，企图捕捉与王前来联系的人。云先生在第二天早上来泰安栈找王若飞，一进门被客栈老板看见，老板急忙对云使了一个眼色，云知道不妙，立即往后转退出栈门，穿小巷，钻胡同，匆匆离去。

王若飞被捕后从包头解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省主席傅作义时常邀他谈话。谈话一般是在午夜秘密进行，由省府机要秘书、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高伯玉用汽车接送。谈话内容是咨询

有关国内外的一些时局动态问题。当王若飞刚到归绥，便被何应钦派到绥省的特务张宣泽侦知，并电告何应钦。何应钦旋即致电傅公，要求将王若飞押送北平行营（何为行营主任）。傅公接电后，乃请示阎锡山绥靖主任，阎复电说：“托辞谢绝。”之后，何应钦又将此事电告蒋介石。不久，何又打着蒋介石的招牌二次要傅公解送王若飞，傅奉阎“再顶回去”的电命，仍不给人。何见说不动，无可奈何，此后再也不追问了。后来由于政局变化，国共间出现了新的关系，阎锡山命将王若飞押送太原。后经中共多方营救，王若飞获得释放。

王若飞在归绥监狱时，傅作义先生对他还算宽待，每月发给十元津贴费，以照顾其生活和身体。

1937年夏的一天，笔者走进省府档案室，见档案架上有一本卷宗，上面贴着标签：“王若飞案”，于是向档案室借出这本卷宗带回办公室，仔细阅读了王若飞在包头亲笔写的“供词”。“供词”写在一张麻纸上，是用毛笔写的，全文大约五百字左右，现只记得这样两句话：“所有责任由我一个人负担，其余的人都是贫苦的老百姓，不要追究他们了。”笔者敬其人而爱其文，几次打算把这份“供词”取下带在身边，据为己有，旋以“七·七”事变爆发，恐有遗失乃止。

屹立在敌后平原上的《人山报》

文 亮 整理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诞生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沿平汉、津浦两铁路线南下，占领了冀南部分县城。日军为了实现其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方针，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1月，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扫荡”；1940年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1941年3月又开始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清剿”、“扫荡”，斗争更加残酷。冀南三分区东抵卫运河，西至平汉线，包括永年、邯郸、曲周、南和、鸡泽、肥乡、磁肥、永肥、馆陶等十一个县，一片平原。中共冀南三地委，为了有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决定在原来专门指导扩军工作的《扩补通讯》的基础上，创办一个地方报纸，定名为《人山报》，意思是：我区虽无山险天然屏障，但有千百万勤劳勇敢的人民，只要把人民动员起来，形成“人山”，不仅可以抵御日本侵略者，而且可以战而胜之。三专署专员孟夫唐为报名题字，苍劲有力的《人山报》三个大字就此铭刻在抗日军民心上，闪耀着胜利之光。

1941年3月8日《人山报》和读者见面了，为八开四版，五日刊。创刊初期由分区文教会主任刘茵兼社长，胡林昉负责编辑

工作。后胡林昀任社长。工作人员有朱力航、李书田、孟南（后投敌）、史建民等。不久，调《冀南日报》记者张大伟到《人山报》，建立通讯联络科，任科长。1942年2月调曲周县文教科 长刘亦耕（刘艺亭）到报社任编辑，建立了编辑部。报社住曲周曹庄，石印机安在东来村一个偏僻场院的地窖里，后来怕送版取报来往多了暴露目标，亦搬到曹庄。

1942年4月29日，日军调动万余兵力，配以坦克、飞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敌人首先合围了武城以北，和邢（台）济（南）路南我党政军机关主要活动地区。冀南区党委、冀南行署和冀南军区等领导机关遭敌包围，军民奋起反击，经过连续突围，受到严重损失，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在浴血奋战中牺牲。“四·二九”以后，敌人增设据点，我根据地缩小，不只回旋困难，而敌人的“扫荡”也更加突然和频繁。仅上半年，敌人平均每日“扫荡”两次，其中千人以上的达十六次。至该年六月底，日伪在冀南建立据点达七百余处，公路沟墙达四千八百八十六里，公路如网，碉堡林立，冀南军民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阶段。为了适应新形势，坚持对敌斗争，精兵简政，实行一元化领导，新闻宣传工作也进行了新的布局，发行全区的《冀南日报》休刊，改由各分区分散办报。如一分区的《黎明报》，二分区的《滏阳报》，四分区的《群众报》相继创刊。三分区的《人山报》也于七月改版，增发电讯，由八开改为四开，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由石印改为油印。工作力量加强了，由一二九师新八旅政治部调黄河（翟向东）来任总编辑，苗青任刻写员。新华社冀南分社的刘盾和胡存夫担任报务员和译电员，筹设专用电台。

八月底或九月初，社长胡林昀，总编黄河，编辑兼党支部书记刘亦耕接地委通知，赶到馆陶县柴堡村，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李福祥和他们谈了抗战形势和分区实现一元化领导后的工

作部署，要求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各种困难，办好报纸。报社根据地委的指示精神，研究了报社所在地曲周、馆陶、丘县三县交界的特点和可能出现的势态，决定化整为零，保存自己，坚持工作。具体安排是：胡林昫带领管理科仍住曹庄，黄河与编辑、刻写人员住军寨，负责发行的李淮、朱克勤住离军寨一二里路的木秀寨。刘盾带电台同志秘密住丘县段寨。各村之间相距最远者不过十里，构成南北点线相连的整体，工作进入新阶段。改版后的《人山报》，内容充实，版面活泼，刻写工整，印刷清楚，套红精确，受到人们欢迎。1943年秋，受到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通报表扬，认为《人山报》是冀南各分区办得较好的一份报纸。

1943年初冬，刘亦耕赴太行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春回报社），1944年春胡林昫调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由黄河接任社长。这期间建立了油印股，苗青任股长，李淮任发行股长，李晓南、柏宏文、郝长江先后来报社任过编辑，修玉澄在通联科工作。

1944年8月，地委通知，原一分区《黎明报》的同志五日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高彩烈地找房子、借桌凳，准备欢迎。原一分区包括大名、魏县、成安、临漳、漳河、南沙六个县，在1943年“五·二六”敌人大“扫荡”中，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受了严重损失，为适应新的情况，一、三分区合并，《黎明报》亦随之合并到《人山报》。五日傍午，原《黎明报》总编程光远带领田辛甫、董武魁、赵华真、秦国英、殷富田、陈昭、杨金铭、申仙洲、郭玉发等十几位同志到了曹庄。两报合并后，黄河任社长，程光远任总编辑，由于人员充实，增强了报社的战斗力。1945年7月间，黄河调平原分局党校学习，程光远任社长，刘亦耕任总编辑。

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胡林昫、黄河、程光远、刘亦耕先后担任过报社党支部书记。党支部是一个战斗集体，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党组织也在斗争中壮大

了自己的队伍。朱力航、朱克勤、李淮、申宗义、殷富田经过党的培养和斗争锻炼，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在最艰苦的1942年至1944年先后入党。党员和非党员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同生死，共患难，胜利地渡过了那些不平凡的日日夜夜。

乔妆为安全，挖洞反“扫荡”

报社驻地虽在曲、馆、丘三县边缘地带，但距敌侯村、丘县据点也不过十来里地。为防御敌人清剿“扫荡”，每天工作一完毕，就把稿件、文具埋藏起来；晚上怕敌人进村，待到夜深人静，便各自背着一条被子分散到田野里睡，冬天找个背风的地方，用被子一裹躺下就睡，醒来后一看，被子上却是一层冰霜。那时，每人除一套换洗的衣服外，别无所有。穿着也尽力同当地农民一样，男同志一律光头，夏天是白土布或紫花布中式裤褂，冬天是粗布棉裤袄，有的加一件黑棉袍，包一块羊肚儿手巾。女同志不管已婚未婚都梳上了发髻，打扮得象农家妇女。名字不群众化也会暴露身分，大家便凑在一起起名字。朱克勤先说：“我叫二顺。”苗青说：“我叫群保。”刘亦耕说：“我叫保魁。”朱力航说：“我叫春贵。”黄河见大家都起了名，说：“我叫山薯吧，山水的山，红薯的薯。”大家听了不由得笑了起来，有的说这名字一转口音就成了“三叔”，于是大家又不同意了，黄河说：“要不就叫老三吧。”当这些新名字叫开时，群众以为黄河真姓黄，就喊他“黄老三”。那时，日伪军对捉住的人还要看手掌，庄稼人掌上都有老茧，拿笔的人没有，刻钢板的茧子全磨在食指和中指中间，而不在手掌上。为使掌上有茧，大家争着帮农民干活，手捋锄杠，好磨出茧子来。

军寨距侯村据点只有十二里路，编写人员在这村住长了怕暴露目标，秘密移住南寨村南头一个闲院，房东住前院，后院没有

门，从墙下面挖个豁口进出，平时则用秫秸堵着，非常隐蔽。编辑部住进后院，连周围住户都未发觉。这天上午，同志们刚刚开始工作，房东神色慌张地跑来说：“你们快跑吧，坞头炮楼上的鬼子进村了！”同志们急忙跳过两处院墙，跑到村南路沟隐蔽起来，敌人催粮半晌方去。待同志们回到住地一看，钢板、蜡纸还在桌上放着。大家感到，还不如在军寨住，消息灵通，便于掩护，于是就又返回军寨。

秋收过后，地里什么遮挡也没有了，平原上一看老远，敌人“扫荡”时人们很难逃脱骑兵的追赶和机枪的扫射。社长胡林昀召集大家到曹庄开会，布置挖藏身洞，个人自选地点，互相保密。大家行动起来以后，到吃饭时碰到一起，真是谁也不说，只是面对面笑笑而已。约过了半月，胡林昀又让大家去看他挖的洞，意思是想总结一下经验。他把大家领到他住的金声家东屋，只见门后挖了个小圆坑坑，一米来深，他跳下去往里一蹲，然后把一个盛苕箬苗、秫秸秆的破筐头盖住坑口，算是隐藏起来了。大家看罢，禁不住一阵哈哈大笑，都说这样的洞很难躲过敌人的眼睛，一旦被敌人发现，只有束手就擒。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挖洞必须挖大洞、深洞，洞口也要搞得非常隐蔽才行。1943年初，参照冀中军民挖地道的经验，编辑部在军寨挖了一条与民兵相通的地道，一直住在曹庄的社部和管理科因为人少，编辑部同志夜晚去帮着挖。洞从朱俊士西院红薯井挖起，向东西两面进展。赶巧挖洞期间敌人进行“扫荡”，发现了依庄民兵的洞口，敌人打着手电下去追捕民兵，民兵边打边退，因为没有出口，转移不出来，现挖了一个出口方逃出来。报社同志接受依庄的教训，洞挖得能攻能守，宽处可以弯着腰跑，窄处只能爬行，大洞可以当工作室和储藏室，小洞只能容一人蹲下。为了应付敌人灌水、放毒气，洞挖得弯弯曲曲，高低起伏，随时可以用土堵断。为了便于打击敌人，朱力能还挖了一条“羊肠小道”。挖时身子躺下伸

直，双手直伸头前，用小板锹砍下一小堆土，用手捧着，把身子退回来，扔下土，再返回去挖。他就这样一捧土、一捧土地挖了几米长的一段羊肠小道。小道两端又都挖了一米的陷阱。同志们看后，齐声称赞，起名叫“鬼子愁”。全社同志都参加了挖洞，编辑部和刻写的同志白天在军寨办报，晚上轮班到曹庄挖洞。管理科长史建民，为挖洞准备好工具，下洞抢重活累活干，洞内潮湿，他长了一身疥。管理员陈晓光只有一只胳膊，下到洞里往地下一躺，右手用板锹把土挖下来，推到腰下，再用两只脚蹬出来，负责运土的同志再装筐运上去。洞下暖和，有的同志光着脊梁趴着干活，汗水伴着泥土，变成了泥人。黎明前，还要把挖出来的新土疏散开去，不留痕迹，免得暴露目标。活儿既累，又没有夜餐，有时总务科分几块花生饼给同志们压饥。

1943年旧历正月十五前后，日军又对平大路东、卫运河以西的馆、曲地带进行“扫荡”。一天上午，一部分敌人由西来村奔往南彦寺，不知为什么，下午又拨马而回到西来村。军寨离西来村只有二里地，白天望得见村头敌人站岗，夜间村里片片火光，听得见杀猪打人的嘶叫声。因摸不准敌人的动向，跑又怕跑不出敌人的包围，决定钻洞。黄河让把自己喂的猪杀了，把肉煮熟，又蒸了几锅窝窝头，送进洞里，和房东段立明订下联系暗号，大家带着被子，先后进洞了。因怕柏宏文、修玉澄的小女儿冬植哭叫，把他一家安排到离洞口最远，离厕所最近的地方。黄河和苗青把红薯叶、破棉絮倾散在屋里地上，推翻桌凳，弄得好象敌人已糟践过一样，然后上房观察动静。突然，“叭！叭！”两枪，子弹从他们头顶飞过，等他俩刚跑进北屋东里间，正要掀起东边窗子跳洞，鬼子就进了院子，一时情急，苗青把手枪忘在炕上，他又急忙爬回去取，还没来得及放好窗户，鬼子就用刺刀戳开屋门进来了，幸好天刚蒙蒙亮，鬼子没有发觉。他俩跳进洞内，把木板托着的糠囤放好。大家屏心静气地坐在洞内，听得见地面上鬼

子走路的皮鞋声。张大伟把头伸到在墙跟上挖的一个小窝窝里，透过气眼，发现敌人要在这座房子里住下了，这下拉紧了每个人的心弦。黄河先让李准等同志把洞口堵死，防止敌人放水、放毒，又让苗青、朱克勤、朱力航等同志移入单人掩体，准备迎击敌人。洞里黑暗，谁也没有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上面蹬蹬的脚步声没有了，安静了很长时间。张大伟又爬到墙跟小窝窝里瞭望，外边一片黑，原来已是夜里了。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上面又有响动了，象是铁镐刨地的声音。啊！房东的粮食就埋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如果敌人刨粮食，洞就有可能被发现。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听见从西口爬过一个人来，接着就闻到一股烟味，大家都警觉起来，黄河持枪问：“谁？不答话就开枪了！”“我，是小保。”小保是民兵，他怎么跑到这儿来啦？原来，民兵们也是在洞里呆的时间长了，又听不见动静，就让小保爬出去探信。他见屋里没人，刚要去开屋门，两扇门忽然大开，两个鬼子端着刺刀一齐进来，把小保逼住，又见洞口敞开着，便命令他把铺炕的干草抱来点着往洞里扔，小保趁鬼子冷不防，猛地把火往上一举，鬼子闪身躲火，他跃身跳下了洞。因民兵的洞和报社的洞通着，小保猛地跳进洞里不辨方向，错爬到报社洞里来了。小保对大家说，王俊卿家的洞已被敌人发现，还在他院子里打死了一个人。大家听罢，赶忙把西洞口堵好，防备敌人下洞或放烟。由于两个洞口都被堵死，单靠一、二个气眼通风，氧气渐渐不够用了，大家喘气都困难起来，生命受到威胁。正在为难之时，上面传来呼隆呼隆三阵打雷声。开始人们不敢相信，再听听，呼隆隆又连着三阵响，于是人们喜笑颜开，叫了起来：“鬼子走啦！”原来这雷声是他们与房东约定的敌人走了的信号。段立明在约定的地方用两块砖夹根木棍，间歇性的连续磨三次，那声音传到地下就象打雷。同志们听见信号响，急忙挖开洞口，爬出洞来。房东一见他们都惊呆了：“你们是人还是鬼？”大家互相看看，个个浑

身灰土，面色煞黄。屈指一算，在洞里整整过了两昼夜啦！而敌人可就住在他们头顶上这三间屋子里，觉得别有意味。朱力航编了个顺口溜：“我们同敌人住一楼，楼上楼下隔地球，两天两夜不见面，倘若见面必恶斗。”自报社在曹庄、军寨挖洞以后，不只在这两村住的同志比较安全，连放在洞里的纸张、油墨、粮食均未受过损失。这是战备工作的一个胜利。与此相反，住在榆林村的电台，因洞未挖好，在跑“扫荡”中，不幸被敌包围，受了很大损失。

从不间断的电讯

电台住在段寨，它北面有坞头炮楼，东北有焦路炮楼，西北八里是敌人占领的丘县城，属于敌占区。这个村在军分区任敌工干事的王执信受命负责电台的安全。开始，电台设在村东头路北只有父子俩的一户老乡家里，收报机就安在他们睡觉的屋子里，每次工作完毕就藏进炕边挖的小洞里。电台一到段寨，总编辑黄河就赶来查看保密情况，他从屋里到屋外，并绕墙转了一圈，总觉得挂在窗外秫秸捆上的天线容易暴露目标，大家端详了半天，就改用院子里晒衣服的铁丝，一端拴在窗棂上。当时使用的是一部破旧不堪的原始三灯再生机，只能听到蚊子哼哼一样微弱的信号，加上天线低陋，一遇风沙、雷电的干扰，很难收好电文。幸亏刘盾是把好手，能收报，会译电，遇有听不清的电码，也能根据微弱的振荡声直书成汉字。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就是他用这架机子抄收的，及时在《人山报》上刊登出来，受到报社同志和领导的赞扬。军分区电台区队长刘纪明得知这个情况，向冀南军区通讯科要来一部新收报机，亲自送到段寨，改善了电台的工作条件。八旅政治部主任王幼平曾两次到段寨检查工作，并介绍他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勉励电台同志努力工作。

当时共产党员刘盾是报务员，早晚两班都是他顶着，译电员胡存夫为了分担他的工作，学习收报，没有振荡器和电键，就采取自念自抄的方法进行练习；没有纸就用手指或木棍在桌面上、炕席上或地上画，后来刘盾把马口铁钉在木板上，制作了一个土电键，刘盾用土电键发报，胡存夫戴上耳机练习抄收，一个月的功夫胡存夫就能担任收报工作了。译电员也是自己培养的，当时只有一个明码本，赵祥全、李林森、刘树杞就拿纸片画上方格，一个字码一个字码地抄下来，装订成册使用。经过互相提问、反复点记，很快就成了译报熟手。当时抄报用的是黄草纸，铅笔剩下一指长的小头头，用纸筒或苇筒插进去继续使用。没有桌子，就伏在炕沿上译报。除工作外，还要推磨、挑水、做饭，并要装成拾粪或串亲戚的样子，按时把译好的电稿送到六里外的编辑部去。

王执信对电台的安全非常负责。一天，他告诉刘盾：“敌人今天要来村催粮，你们可到村外躲一躲。”刘盾他们跳过北边的院墙，躲进一块枝叶茂密的棉花地里蹲着，果然见一队鬼子和伪军到段寨来了，呆了两三个小时才回县城。1943年春节过后不久，敌人连续“清剿”，王执信怕电台同志在这村呆久了容易暴露，黑夜带领他们到坞头炮楼底下躲躲。在村西一户老乡家住了两天，等敌人“清剿”过后才又回到段寨。

为了安全及保密，电台另找了一个房东，并在长满荒草的油坊东院破车棚里挖了一个地洞，洞口用一堆杂草和破烂农具挡住。一天早晚两次在洞内收报，洞里很暗，点着棉油灯，气眼设在椿树根下，工作一两个小时，因氧气不足，便会腿软心慌，但他们每天坚持完成抄收任务。

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电台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电池供应不足。刚建电台时，从军分区领的散装小电池，必须用铜丝或锡焊接起来才能用，他们通过群众各处寻找，连一寸长的铜丝也没有

找到。赶巧这天村上来了个货郎担，刘盾发现货挑子上摆着一个缀着蝴蝶的小花帽，用来拴铃铛的竟是一小卷铜线。刘盾再三和货郎商量，总算把这卷铜线买了回来，焊接好电池，一直用了好几个月。这天下午，刘盾发现电池没电了，急忙到曹庄找陈晓光说：“电池没电了，得马上去领。”陈晓光一边埋怨要得急，一边准备出发。他急忙披件夹袄，拿了巴掌大的两块花生仁饼就上路了。走了五六十里路，天黑时在馆陶徘徊头找到军分区后方供给处。人家说：“你要得再紧，现在也不能给你。”“怎么，没在手下？”那位同志点了点头。陈晓光只好安下心来休息。快到下半夜了，供应处的同志交给他四块方电池。陈晓光用破布袋把电池一装，背起来就往回赶，走得实在累了就躺在路边打个盹，第二天小晌午回到曹庄，总算没耽误电台使用。

1943年春荒，电台这几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和大家供给一样，每日十二两小米，每顿按量下锅，吃稀粥为主，间或蒸点掺糠、掺花生皮的玉米面饼子。一次，他们一下子领来二百斤小米，大家看着真是又喜又怕，喜的是有这么多好粮食吃；怕的是被敌人抢了去。几经商议，黑夜埋在房东的东跨院里，不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全部被人偷去。大家悔恨不已，如实报告了领导。黄河去查看了现场，认为不致于出别的问题，安慰他们说：“丢了就丢了，今后多注意就是了。”几个青年才放下心来。但是，灾荒越来越严重了，村子里很多人外出逃荒，这对他们又是个严重考验。家在敌占区永年城里的刘树杞，回家后就再没有回来。由于生活困难和工作劳累，经过长征的“红小鬼”共产党员苏传兴，患了肺结核，经常咳嗽咳血。他默默地忍受着高烧和病痛的折磨，不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依然处处起带头作用，后来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终因病情恶化，于1944年夏不幸逝世。

一天夜里，敌工站通知说：丘县敌人明天要到段寨来，企图不明。他们于天亮前躲到村南二、三里外交通沟里，可是到多半

早晨了，还听不见村里的动静，大家让赵祥全回去侦察一下。他才十六岁，是个孩子，不会被人注意。赵祥全绕道村东，顺着交通沟潜入村内，先到原先住的房东家打听消息，说敌人进村后未抓人也未找地洞。他又拐弯抹角地到油坊东院看了看，也没发现敌人来过的迹象，便顺原路出村。不料，刚一跳出交通沟，突然从前边一个小坑洼里钻出两个伪军来，端着枪喊叫：“站住！”赵祥全心想：糟了，跑不了啦，自己穿的棉袍是白里子（群众都穿老蓝里），口音又不对，决心来个以硬碰硬。当两个伪军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八路。”“干什么工作？”“通讯员。”说到这，他用满不在乎的腔调说：“这年头，都是出来混碗饭吃，够朋友，就把我放出去，告诉我你俩的名字，后会有期；如果不够朋友，你们就把我撂倒，决不含糊。”两个伪军被他正义凛然的气概所压倒，一个说：“小兄弟，够汉子，够朋友，咱们算认识啦，我叫×××，他叫×××，我们放两枪，你就只管跑吧。”赵祥全答应一声，转身顺路向东跑去，耳后响起了枪声和两个伪军的呼叫声。卧在南面交通沟里的同志们听见枪声，又看着赵祥全在跑，个个为他捏一把汗。中午，敌人走了，大家见赵祥全安全归来，都很高兴。赵祥全把两个伪军的名字告诉了敌工站的王执信。

在段寨住久了怕有闪失，1943年冬即迁到榆林村，和军分区军法处住在一个胡同里。上级委托军法处长张昇予以照顾。为了收报安全，他们临时在柴禾垛里掏了一个洞，里边放一张单桌，一个凳子，收报时挤进去，让在外面放哨的同志用柴禾把口堵好，虽然柴棚低矮狭小，灯烟熏人，为了收报心里觉得欢快坦然。

旧历年后的一天拂晓，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敌人又来“扫荡”了。这时，军法处和电台合挖的地洞洞口尚未伪装好，大家不敢往里钻，便跟着群众一起往村南跑。出村不远，就见南边村里的